

# 传统训诂学当代“接着讲”

——读吴泽顺《清以前汉语音训材料整理与研究》

□ 陈青松

冯友兰先生认为讲自然科学可以抛开科学史来讲,但讲人文学科却离不开学术史,必须“接着讲”。美学家叶朗先生特别推崇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多次强调“人文学科的理论创造必须‘接着讲’”,认为“人文学科的新的创作必须尊重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经典创造和学术积累,必须从经典思想家‘接着讲’”,“我们的人文学科要有所创新,应该从这些前辈大师那里‘接着讲’”。<sup>①</sup>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在西方语言学传入之前,已经有了2000余年的研究历史,清末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序中说:“上古渺矣,汉承秦火,郑许辈起,务究元本,而小学乃权舆焉。自汉以降,小学旁分,各有专门。……不外训诂、音韵、字书三者之学。”<sup>②</sup>传统小学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形成深厚的优良学术传统。但传统语言研究不是严格意义的语言学,多是基于“通经”这一实用目的而发展的,按王力先生的说法,还属于“传统语文学”的范畴。<sup>③</sup>其主要任务是处理语料、分析语料、解释字词、考证版本,其理论则散见于各字例的训释中,没有能升华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没有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反映的汉语特点零乱而分散、不成体系,<sup>④</sup>传统小学是“未竟之业”,“有待我们今人完成而后来居上”。<sup>⑤</sup>语言学在当代被认为是“领先的学科”,不可能凭空发展,“接着讲”传统的“小学”,也是新一代学人责任。

训诂学属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探求语义的一门学问。因时有变革,地有阻隔,音有流变,义有转移,词有孳乳,历史文献的理解和思想

精华的把握必然导致训诂的产生。孔颖达《毛诗正义》疏:“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清人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进一步阐发这种思想:“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盖时有古今,犹地之有东西有南北,相隔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sup>⑥</sup>训诂学的发展历史也反映了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中重视语义的优势,积累了历代学人在语义分析方面的智慧。和曾经很流行的主要关注形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等不同,当代语言学越来越重视语义问题。而且,人类语言学、词源学、认知语义学等的兴起,也呼唤传统训诂学能够提供更多理论和基础材料的支撑。吕叔湘先生曾论及汉语研究界的“两张皮”问题:“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一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sup>⑦</sup>新时期的训诂学研究需要打通古今、融合中外、兼顾体用,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做了很多振聋发聩的呼吁和有益的尝试,如陆宗达等先生就提出要专门探讨“训诂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王宁先生说:“训诂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古老,却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它除了还具有充当认识古代的工具这一实用价值外,在理论的发展上,也还没有终结。”<sup>⑧</sup>就目前的情况看,传统训诂学如何“接着讲”,仍然是一个摆在新时期语言学者面前的大课题。

吴泽顺先生的《清以前汉语音训材料整理与研究》一书(入选国家社科成果文库,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下简称《音训》。下面涉及该书观点和材料时,直接叙述不一一注明出处),正是“接着讲”训诂学的一个有益尝试。这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理论篇)对相关时代的音训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探讨音训的本质,分析不同历史时期音训的特点,厘清音训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发展脉络。下编(材料篇)是对清代以前60余种音训材料全面收集与系统整理,最后按时代和作者汇编成集。

这本书具有如下一些特色:

首先,该书把“接着讲”放在音训的大历史中,理清了清代以前音训发展的历史脉络。音训,也叫“声训”,是训诂的三种方法之一(另外两种是形训和义训),是一种以语音的相似性或语音流转、演变关系为媒介的词语意义或词语关系的探求与解释。张之洞说:“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说文解字义证·序》),黄侃先生曾统计说:“《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释名》《方言》)更是有意识地用音训的方法构建自己的词汇语义体系。音训方法在两千余年间,<sup>①</sup>从实践到理论,从无意识到自觉,从零散到全面,一步一步,日臻成熟。

声音和意义的匹配是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因声求义本是自然之道,但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由于中国文字的特殊,不但使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在世界上放出异彩,而且影响了中国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研究”。<sup>②</sup>因形求义往往成为最直观的路径,因此音训的方法一直到了清代才真正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认知层面。清代的王、戴诸家,是音训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成就,就是站在了这些前人的肩膀上,全面系统地阐释这一巨大的学术历史过程是必要的。厘清有关音训的学术思想史和学术方法史,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清代小学研究的价值和地位。而《音训》的“理论篇”其实就是这样一部音训思想史和音训方法史。该书分“音训之滥觞:先秦典籍中的正文声训”“音训之渊薮:两汉魏晋时期的经注与训诂专书”“音训之嬗革:唐宋元明时期的音训特色”等三大音训历史时期展开。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文献的音训特点:(一)先秦及

两汉正文音训重在正名,主要是一种修辞文化的反映。(二)毛郑音训重在求古今之变,以声音通训诂。西汉毛亨《毛诗故训传》主要以“某,某也”的形式,用同义词和音同音近的字解释词义。东汉郑玄充分利用语音的线索来探求词义,建立“就音求义”的训诂原则,对古代文献中的音训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三)《释名》开日用事物语源探求之先河。将音训从经注中解放出来,内容上从文献词语的探源扩大到日用事物,使其具有了语言研究的本质属性。(四)“亦声说”与“右文说”前后相承,揭秘形声字之奥秘。(五)宋元音训术语日渐完善。如戴侗系统运用“同近通转”等术语贯穿各类音训材料,方以智以理论自觉系统运用“同”“近”“通”“转”等术语,黄生高张汉学旗帜,将因声求义之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给清代乾嘉学派以直接的影响。自汉至明末,音训传统并未中断,求源与求义两条线索交叉发展,经历代训诂学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至清代终于把这门古老的学科推进到了科学的边缘。总体来看,该书特别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音训著作进行专题研究,横向比较,纵向系联,串通成一部完整的清代之前的音训史。

其次,该书把理论构建作为“接着讲”的研究皈依,在述史的同时,试图建构有关音训的系统理论。在上世纪末,陆俭明、郭锐先生说:“中国的学术传统是重事实,强调爬梳。这无疑是一种求实的好学风。但是我们也应从中看到我们在治学上不足的一面,那就是罗列事实。要说明什么问题,有时自己也不清楚;怎样从自己所掌握的事实中提炼出理论观点,一般人很少去考虑。”<sup>③</sup>陆宗达、王宁先生也直面传统训诂学的一些局限,如“概念模糊、术语含混”“立论不周密”“缺乏发展观点”等<sup>④</sup>。陆先生还认为“要想真正救活训诂学,必须从原始的材料中提炼出基础理论和可供操作的方法”。在训诂学众多概念之中,“音训”堪称在运用和认识上意见最为歧出的重要概念之一。《音训》系统占有音训资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全面审视音训问题,对历史上的一些有关音训的分歧进行梳理,对一些音训材料进行甄别反思,对音训的认识也更加准确和全面。音训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音训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和学术源流。该书把广义的音训大致上分为四类:(一)推源式声训,即具有语源关系的。如《说文解字》:“户,护也。”“羊,祥也。”

这类声训以探求事物命名之源来释义。(二)求义式声训,探求同义关系。如《毛诗传》:“蒙,覆也。”“氓,民也。”即清儒所谓因声求义。(三)异文式声训,即由不同的文献异文所构成的声训。文献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音训原理改换字形,后辈学人据此逆推语源的音训,如《史记》的引书异文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版本异文。(四)修辞式声训,即二者既不具有语源关系,也不具有同义关系的推源式声训。第四类情况最为复杂,也正是音训为人诟病最多的类型。对音训的正确分类,是解决音训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不同的类型音训,其基本原理相通,但具体的操作过程和科学性却有差异。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还充分应用普通语言学 and 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音训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解释。王宁先生曾提出:在中国语言学里,一直认为语言的理据性和任意性是不矛盾的,“约定俗成”和“音近义通”可以是共存的。而该书进一步在理论上弥补语言任意性和理据性之间的鸿沟,提出:语音和语义之间的关系像似性是音训存在的认知基础。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具有像似性,即语音形式和概念内容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形式是概念的象征,可分为成分像似和关系像似两种。语音之间的相近相关和语义之间的相近相关正是语言像似性的表现之一,这是一种关系像似。无论是求源还是求义的音训,一方面语音和语义的隐喻,另一方面又是语音域和语义域各自内部的转喻。该书的这些认识,赋予古老的训诂学以现代语言学视野,充分体现了训诂学“接着讲”的时代感和理论深度。

再次,该书把充分挖掘和系统整理音训资料作为进一步“接着讲”的重要基础。陆宗达、王宁先生说:“在发展古代汉语以至现代汉语词义学时,旧的训诂材料不是可以作废了,而是还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断代的研究中,从先秦文献的语言入手,首先把‘九经三传’的训诂材料充分运用起来总结出规律,确实是发展科学训诂学的一条从实际出发的途径。而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得多了,而是做得很不够。”<sup>⑨</sup>音训研究在清代蔚为大观,其研究对象也是历史文献,如何有效处理和利用这些清代以前的音训材料,不光在清代,在现代同样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我国的传统学术研究曾有一个倾向,那就是讲究“功底”,功底的一种表现

就是常常依赖学者个人收集或记忆的文献材料来论证观点,这种倾向是个好传统,但也有一个明显弱点,那就是论证常常是举例性的、经验性的,即使是各种维度的系联法,也往往难以穷尽实际材料。这不光导致该领域入门难,跨学科的资料利用更难,必然减弱了该领域研究应有的影响力和价值。因此,尽可能地挖掘和收集已有的音训材料,是音训现代“接着讲”的基础。《音训》有一半的篇幅是历史音训材料的整理,我们认为主要价值有:(一)全面梳理了显性和隐性的各种音训术语和结构形式体系,在形式特征上简化和规范化了音训手段的认证。(二)细致地对音训资料进行系统挖掘和甄别。一些散见于历史文献的有价值的音训材料过去在学界尚未引起重视,如司马迁的《史记》引书异文、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基的《菜窝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的音训材料,很多都是在该书中第一次得到系统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此外,该书还将民间语讹、谐音习俗等俗语源材料纳入研究范围,对我们认识音训的本质和成因,提供了活的语言范例和参照。(三)资料的汇编为后续研究提供不一样的基础支持。以往的音训研究往往是举例性的,不仅依赖于研究者本身知识的广博和记忆能力,更依赖于研究者对材料内容的理解。而近来兴起的“大数据”研究,改变了研究的思路,只关注数据的“相关性”,淡化了对数据“内容”的真正理解。有了大规模音训材料的汇集,无须研究者深入理解和主观选择,就可以发现很多音训规律。有很多学者批判当代的训诂学多是爬梳文献,分类贴标签,常为人诟病。而章太炎先生《文始》的研究套路却为学者们推崇,如充分运用语音流转的规律,如从“原,元也”出发,把“兀、元、原”等系联成一个系统,以窥古人的思想文化特征。这种语音关联和语义关联的深度对应关系的梳理,无疑是当代训诂学在词源学方面最有学术价值的道路之一,而这条道路能否走得更为广阔而系统,取决于基础资料的全面性。(四)资料的完整汇编,是让优秀的传统音训成果为其他学科所用的基础。王国维说“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他学”。江蓝生先生提出语言学研究要实现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之间的沟通,方言学与汉语史的沟通,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的沟通,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

族语言研究的沟通,中国境内语言的研究与外语研究的沟通等等。还要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沟通,如与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的沟通。<sup>⑭</sup>音训资料的系统汇编,可以为“沟通”各方服务。如历史比较语言学中汉语和其他语言的亲缘关系研究,就可以基于词汇孳乳的语义网络和语音流转的对应关系,来做亲属语言之间同源词的系统深层比较,如同一词根分化的“孳孳词”的比较。部分音训材料系联后同源词族越多,亲属语言之间比较的基础就越厚实。再如,历史音训材料越全面,越能为研究古代思想文化特征提供启发和佐证,如季羨林先生介绍自己的《对〈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的一点补充》时说:“我发现,从《世说新语》直到敦煌变文,教、交、校、较、效、觉等字,都是同音同义。”<sup>⑮</sup>音训的研究,其成果如能方便而且广泛地应用于其他领域,就能避免其滑入自说自话、自得其乐的泥淖中。

“清人在‘小学’的领域上,开中国语言学的新纪元。”<sup>⑯</sup>音训方法至清代才日臻完善,但一种科学方法的成熟并非凭空而降,一种研究方法的分歧和误用也并非一日之寒,背后往往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过程,对清代之前音训材料的全面系统研究正好有助于厘清这个过程,认清音训的本来面目。该书对清代以前的音训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不但有助于廓清音训的复杂理论问题,有助于正确认识清代以迄当代音训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同时也通过资料汇集与理论探索,为传统训诂学“接着说”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提供新的“邀约”。

在传统学术“接着讲”中,“立”比“破”更重要。季羨林先生说:“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必有其优异之处、可传之处,否则早已被淘汰掉了。现在有一些先生总是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我认为,与其说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为什么不能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矣’呢?”<sup>⑰</sup>如何在继承学术传统中“立”?叶朗先生说:“在学术、文化领域,特别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自己民族的文化。”<sup>⑱</sup>传统的小学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以表意文字为记录符号的汉语,古代学人却能够突破形体而让音训手法得以广泛应用,这点尤为可贵,进一步使语义

分析成为我国传统语言研究的一大亮点和优势,这就是我们的“立足点”。沈家焯先生在给《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的序中说“每个时代的学术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语言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也不例外”;“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最主要的表现是:眼光和观念的更新,理论和方法的改进”。<sup>⑲</sup>王宁先生认为训诂学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概念,她展望训诂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曾满怀激情地说:“一门或数门新的学科将在它的基础上产生并日渐丰富,它们将取代旧训诂学,以崭新的姿态,在现代科学之林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中华民族堪称灿烂又令人羡慕的文化遗产一起,进入世界,走向未来!”<sup>⑳</sup>也许,传统训诂学的“接着讲”,《音训》这样的成果多一点,走向王先生所展望的未来就会更近一点。

#### 注释:

①叶朗:《意象照亮人生:叶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②黄德宽:《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定位与发展思路之我见》,《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第1期。

③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

④钱宗武、李仕春:《论中国语言学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⑤许威汉:《论我国语言学的继承与发展——兼述东西方文化培育中国语言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⑥刘又辛、李茂康:《训诂学新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页。

⑦吕叔湘:《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学术报告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⑧⑲王宁:《试论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及其旧质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⑩据黄侃先生的说法,《大戴礼记》载虞史伯夷之言:“明,孟也;幽,幼也”,是最早的音训(声训),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

⑪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0页。

⑫陆俭明、郭锐:《汉语语法所面临的挑战》,《马氏文通与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9页。

⑬⑭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9、26页。

第137~138、109页。

④⑦⑧⑨⑩⑬⑮⑲(明)王阳明:《传习录上》,载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2、24、34、32、29、30、2页。

⑤⑪⑫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明)王阳明:《传习录中》,载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8、51、83、56、78、90、71、90、92、56、96、96、89、61、62、60~62、90页。

⑰董平教授认为,在阳明心学的理解与实践上,良知的公共性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解构的,否则个体性维度的“致良知”,就可能变成事实上的“致私意”。参见董平:“阳明心学的定性及良知的公共性与无善无恶”,《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⑳㉗(明)王阳明:《大学问》,载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1066、1067页。

㉘(明)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邹守益集》卷二,

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0页。

㉙(明)王阳明:《谕泰和杨茂》,载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四,第1013页。

㉚《传习录下》“钱德洪附记”,载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34页。

㉛《王阳明年谱三》,载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424页。

㉜(清)焦循:《良知论》,载《雕菴集》卷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3页。

㉝(明)王阳明:《寄邹谦之》二,载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六,第225页。

㉞(明)王阳明:《南赣乡约》,载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七,第664~665页。

责任编辑 刘 洋

(上接第154页)

⑭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

⑮季羨林:《我的学术人生》,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其中的“校”,该书原文作“拔”,不通,此径改作“校”,“校”与“教、交、校、理、较、效、觉”等字,古代音近义通。此点承张涌泉先生指出,谨致谢忱。

⑯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

⑰季羨林:《我的学术人生》,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

版,第106页。

⑱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⑲蒋严主编:《走近形式语用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刘 洋